

# 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动因探析

朱国宏

## 一 东南亚华侨人口与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

学术界对于“华侨”一词尚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而言,在海外的中国人可分为三类:华侨、华人与华裔。而这三类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只是以是否入籍作为标准泛泛区分。实际上,广泛意义上的华人已包括华侨和华裔在内,这便是国外学者所统称的“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或“在国外的中国人”(Chinese Abroad)。笔者认为,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应视研究对象而定。本文所说的“华侨人口”按照海内外现有的统计口径与一般理解规定为相当于“海外华人”的范畴,可能有助于对“华侨人口”的历史演变和当前现实的把握<sup>①</sup>。

与华侨人口范畴的规定相关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华侨人口?其分布状况如何?因无精确的统计以及统计口径上差别,这个问题向来是华侨问题研究中众说纷纭的焦点之一。公诸于众的数字大多是由有关部门或人士估算出来的。

表1所列数字是有关资料对历史上华侨人口变动的估计数。时至今日,世界拥有华侨人口近3千万,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而各大洲的分布状况,也是由有关人士或部门的估计来描述的。《华侨人口参考资料》一书曾比较详尽地列举过50年代前后的各国华侨人口数。陈烈甫先生在其论著《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一书中公布了1975年的调查结果。最新的洲别数字是由《海外赤子——华侨》一书的附表提供的,但其总数与陈氏估算相去不远(分别为2 210万和2 202万),均未达到《人民日报》所估计的3千万的水平。考虑到统计资料本身的全面性和代表性,这里以陈氏的估计数作为基础来考察华侨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福建籍的华侨人口情况。

华侨人口在各大洲的分布状况如表2所示。华侨人口虽然分布广泛,但其绝大部分集中于亚洲地区,占总数的94.25%,达2千万。在亚洲的2千万华侨人口中,有1千9百多万集中于东南亚一带,占世界华侨人口总数的88.14%,占亚洲总数的93.52%。东南亚9国所拥有的华侨人口以印度尼西亚为最多,其次是马来西亚,再次是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其华侨人口数均超过1百万,如表3所示。

这些华侨人口以闽粤籍为最多。就东南亚而言,闽粤籍华侨人口占90%以上。根据1934年的调查材料,福建籍的华侨人口约占东南亚华侨人口的30%,仅次于广东籍的华侨人口数(见表4)。这个比例为大多学者所承认,虽至今日,尚无大的变动。当然,各省籍华侨人口在东南亚各国的分布是有差异的,大致情况可参见表5。其中,福建籍的华侨人口还包括表中的客家人的一小部分。可见,福建籍华侨人口大多分布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

那么,福建籍华侨人口究竟有多少呢?一般的估计是6百万左右。这种估计源于推算,即以世界华侨人口总数为2千万左右,而福建籍占约为28%,则为6百万左右。如这种推算可信,时至今日,即以2千2百万的华侨人口总数计,福建籍华侨人口亦达7百万了。笔者对《华侨人口参考资料》、《华侨经济年鉴》(1973年)、《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南洋论》等书有关籍贯构成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表5所列各籍比例大致是与事实吻合的,并据此对表3的数字进行推算,得出结果如表6所示。可见,福建籍华侨人口超过7百万,与前估计相合。而福建籍华侨人口另有小部分分布于东南亚以外的各个国家。据此,认为福建籍华侨人口总数不低于7百万是可信的,比以《人民日报》公布数字为基础进行推算的总数还要

<sup>①</sup> 关于“华侨”和“华侨人口”范畴规定,参见拙作《华侨定义演变和华侨人口范畴规定之我见》,载《南方人口》1986年第3期。

表1

历年世界华侨人口变化估计

年 代	人数(万)	资 料 来 源	备 注
宋代至鸦片战争前	数万至1百多万	厦门大学历史所《东南亚论文集》	
1879	300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1899	400		
1905	760		
1921	860	《南洋研究》2卷5号	
1931	1 282	《南大与华侨》11卷3号	其中包括台湾和港澳
1940	850	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	
1956	1 400		
1962	1 600		
1975	2 200	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	
1982	2 400	《中国百科年鉴》	
1984	近 3 000	《人民日报》	

表2 世界各大洲华侨人口的分布情况  
(1975年底)

洲 别	华侨人口(人)	占华侨人口总数
亚洲*	20 758 228	94.25
美洲	926 411	4.21
欧洲	197 520	0.89
大洋洲	74 709	0.34
非洲	68 114	0.31
各洲总计	22 025 482	100

\* 亚洲华侨人口中含港澳地区华侨人口4 389 000人。  
资料来源：根据陈烈甫《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华裔》  
第17页表整理，台北，1978年。

表3 东南亚华侨人口统计表

国 别	华侨人口(人)	统计年份
新加坡	1 922 660	1984
马来西亚	4 531 000	1980
菲律宾	1 000 000	1983
印度尼西亚	6 000 000	1983
泰 国	4 500 000	1978
緬 甸	700 000	1978
越 南	700 000	1983
柬埔寨	50 000	1983
老 挝	10 000	1983
东南亚9国 合 计	19 413 660	

资料来源：根据郑民等著《海外赤子——华侨》一书  
附表整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表4 东南亚华侨人口籍贯分布

籍 贯	比重(%)
闽 南 人	28.16
广 府 人	18.45
潮 州 人	29.46
客 家 人	12.15
海 南 人	5.69
云 南 人	1.10
其 他	4.99
合 计	100

资料来源：高事恒著《南洋论》，南洋经济研究所出版，1947年。

表5 东南亚各国华侨国籍分布

籍贯 国别	福 建	广 府	潮 州	客 家	海 南	其 它
泰 国	10	8	60	10	10	12
马来西亚*	30	26	11	22	9.5	5.5
新加坡	40	18	23	1		18
印度尼西亚	55	15	10	20		
菲 律 宾	80	20				
越 南	8	41	37	11	3	
柬埔寨	6	15	67	5	7	
緬 甸	50					50

\*原文如此，合计数超过100%。

资料来源：根据黄天爵《华侨经济问题》一书的材料编制，台北，1962年。

多。

总的说来，福建籍华侨人口是集中于东南亚一带的，其它国家所占比例是极微的。因此，考察东南亚华侨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福建籍华侨人口在东南亚的分布不平衡，占绝对数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约330万，其次是马来西亚，约136万人，再次是菲律宾和新加坡，分别为80万和77万。其中，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福建籍华侨人口超过广东籍的华侨人口。

华侨人口包括原迁的、新迁的和其后裔（华侨或华人、新客和侨生）。所谓福建籍的华侨人口并不都是从福建省迁出的，同样，从福建省迁出的人口也不都包括在华侨人口中。作为一种国际迁移的社会现象，华侨人口是人口国际迁移直接后果，是与迁移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也就引出了一系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福建人迁居海外，他们为什么要迁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迁出的，以及为什么要迁居东南亚？如此等等。这当然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很多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里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过程的观察，探讨其作为一种国际迁移行为产生的动因。

## 二 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①

（一）早期福建人口迁移海外的现象。中国人迁居海外的事实，多数学者推秦时为最古。佐证资料有二：（1）《史记》载，秦始皇派徐福至安南（今越南）求长生药，结果连徐福也流居“平原广泽”而未归；（2）《菲律宾史》载，秦时有人至菲律宾②。而福建人迁居海外的史实，有史料可考的可能应推汉朝为最早。《后汉书·郑弘传》载，公元83年（后汉建初8年），“有旧交趾七郡贡献，皆从东冶（今福建全省在

① 参见《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载《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1、3期。

② 参见《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观察》，载《人口研究》1987年第4期。

表6 东南亚华侨人口的分布

国 别	福建籍华侨人口 (千人)	占当地华侨人口总数 %
泰 国	450	10
马来西亚	1 359	30
新 加 坡	769	40
印 尼	3 300	55
菲 律 宾	800	80
越 南	560	8
柬 埔 寨	30	6
老 挝*	2	20
合 计	7 270	—

\*老挝华侨人口中福建籍比例源自《华侨人口参考资料》，华侨问题研究会编，1956年。

资料来源：根据表2、表3整理。

内)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又《后汉书·东夷列传》载,东汉时,“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今菲律宾)”。这是福建人流寓海外见于史册的最早记录。可见,当时已有外事往来。

汉朝以后,福建人与海外的往来散见于历代史书中。如《三国志》载:黄龙二年(230年)正月派兵万人浮海求宜州夷州。《续高僧传》卷二载,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565年从泉州乘船归国。凡此种种,还可见之于《梁书》、《汉书地理志》、《隋书》等史书。不过,这一时期福建人往海外多带使节往来、僧事往来或开辟疆土的性质,客居海外不为多数。带有谋生性质而迁居海外的,到唐以后始普遍起来。

唐之后,海上交通业发达起来,与海外的往来也愈加频繁。汉唐兴福州港,极盛于五代,随后泉州港继兴,唐时泉州港即与广州、扬州、交州并列为我国4大对外贸易商港,宋元使泉州成为国际贸易市场,明后漳州港极盛,厦门港也开始了与海外往来。这为福建人口迁移海外提供了客观的交通条件,可以说,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是与海上交通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贸易往来比较频繁,不少外国商人到福建经商,如阿拉伯人、波斯人到泉州从事贸易活动;同时,也有不少泉州人到海外经商。《诸蕃志》载:“泉州至本国(占城),顺风舟行二十余程……商舶到其国…蕃商兴贩……”。汪大渊《岛夷志略》古里地闷(今帝汶)条载:“若泉州之吴宅,发舶称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又载:“元至元29年,福建派兵三万,去侵占城,又令军会泉州去侵爪哇。”周致中《异域志》载:泉州与爪哇之杜板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通往,流寓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吴自牧《梦梁录》云:“若欲航海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可见,自唐以后,福建人往海外已非罕见,大多为商贩的市舶往来,最终“流寓异地”的还有一部分是战争病残卒留海外,“不复归”的。说明这时的福建人迁居海外已带有自发的性质。

当然,这种迁居海外是间或的和少量的,但时间长了,流寓海外的福建人也多了起来,据《明史·吕宋传》载,万历31年(1663年),泉漳人贩吕宋者数万人,华人被杀死者二万多人。可见,到明时,仅吕宋即有好几万华人了,其中福建人当不为少数。

但是,由于没有史料记载,福建人迁居海外的数字终无可考。从抽样调查的数字,也许可以窥见一斑。1958年南洋研究所在闽南一带调查<sup>①</sup>,从几十部族谱中抄录了有关华侨史料2千多条,以出国外人数最多的年份为依据(不是整个朝代),就晋江、南安、永春、安溪4县出外人数统计:明万历49人,清顺治22人,康熙61人,雍正42人,乾隆220人,嘉庆157人,道光361人,咸丰219人,同治263人,光绪383人,宣统5人。这些仅是族谱上载明姓名的人数,且只有4县的统计,而不见于族谱,加上其它地方的,恐怕应以10倍乃至数十倍来计算。说明福建人口历代迁移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据《东西洋考》等史籍文献记载,明代后期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商的活动范围,遍及东南亚各国,而与菲律宾的贸易最盛,尤以马尼拉地区首屈一指。墨西哥出版的《奇异旅行》一书称,往来于海上的中国商船甚多,“大部分来自福建漳州和厦门”。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人迁居海外,除东南亚外,其足迹还遍及阿拉伯、朝鲜和日本等国。《宋史·高丽传》说:“王城(今开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又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闽越吴之人,位于倭岛者,不知几千万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

但总的说来,在鸦片战争以前,福建人迁居海外的现象虽然日趋普遍,但多数为经商或谋生而去,定居下来“娶番生子”的可能多属无奈,还有一些就是因国内的乱世而被迫逃生海外的,估计每年迁出的人数不会很多。大规模迁居海外的现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

(二)近现代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及特点。近现代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以大规模的契约华工出国为主要特点。契约华工制实质上是一种强迫性的国际迁移,是西方殖民者招募掠夺劳动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它的产生可追溯到18世纪,而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始告结束。近现代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自发迁出的同时,契约华工制开始萌芽。但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数量很少,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违法的,因此,是在隐蔽的形式下悄悄地进行的。

第二阶段,1840年至70年代末,是契约华工出国的高潮阶段。大批的契约华工被贩卖到东南亚及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福建的厦门港成为契约华工出国的重要港口。这一时期福建人迁往海外的特点是,迁出人口

<sup>①</sup> 《福建华侨企业调查报告》,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研究所集刊》国庆专号。

骤增，出国口岸除厦门外，还有福州港以及广东的广州港、汕头港等港口，迁出的地区范围也比以前更为广泛，“猪仔”贸易成为主要形式。

第三阶段，19世纪70年代末至19世纪末年，是契约华工出国开始衰落的阶段。这一阶段，作为契约华工制高峰重要标志的“猪仔”制已受到严重打击，满清政府迫于社会议论已在沿海口岸比较严厉地制止卖“猪仔”，加上契约华工的不断的反抗斗争，“猪仔”贸易又转入隐蔽的形式进行，契约华工出国的数量和规模开始出现衰落的征象。但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出国人数仍是比较多的。

第四阶段，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契约华工出国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里，契约华工出国的数量和规模继续减少，其特点也由原来的“猪仔”贸易转为外国政府的“招募”制，招募的契约华工一时猛增，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到20年代末，大部份地区已经废除了契约华工制。

第五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这一时期里，福建人口迁出海外的过程是波折起伏的。先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形成了东南亚地区大规模的回国迁移，其数量以几十万计。紧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迁出人数又逐渐增多。40年代初，战火蔓延到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线为战争所阻隔，形成短暂的迁出停滞。40年代末的国内战争又诱发了迁出的回潮。总之，这一阶段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仅有迁出，还有大规模的回归迁移，而迁移形式则以自由迁移为主。

由上可见，近现代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其数量和规模都是巨大的，而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地区范围也是相当广泛的。但是，究竟有多少福建人在这一时期里迁出海外，准确的统计数字是无法取得的，直接的估计数亦未见于史册。

华工出国时期无疑是福建人口外迁的高峰时期，而这些迁移人口大多是由厦门港迁出的。笔者就有关资料加以估计，契约华工时期，由厦门港迁出的人口历年变化情况如表7所示。表中所列30年中约有近2百万人由厦门港迁出，每年约有6万人。若以每年5万人计，从1845年到1920年的75年间，约有375万福建人迁出。若以每年4万人计，也有约30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是从福州港或广东的其它港口迁出的。而从20年代到1949年30年间，据有关人士估计，每年迁出人数在5万以上，若以此计，也当有150万福建人迁出。这样，笔者估计，从19世纪初到1949年的150年间，福建人口迁出的数量大致是500万左右。

表7 1845—1917年由厦门迁出人数

年份	人数(人)	年份	人数(人)	年份	人数(人)	年份	人数(人)
1845	180	1879	20 764	1887	66 624	1894	54 844
1850	1 000	1880	24 318	1888	54 288	1895	66 560
1852	1 700	1881	33 475	1889	55 194	1896	61 217
1853	5 556	1882	35 270	1890	50 217	1900	79 243
1875	16 683	1883	53 998	1891	78 311	1902	126 008
1876	18 338	1884	45 309	1892	60 204	1912	66 907
1877	23 279	1885	43 613	1893	74 012	1917	77 781
1878	24 524	1886	50 872				

资料来源：①1845—53年数字见《国际迁移》(International Migration)卷一页927。

②1875—96年数字见《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会刊》(文《菲律宾的华工问题》)，卷33页157—180。

③1900—17年数字见《关册》。

当然，作为一种迁移过程，这些迁出的福建人口并不都能到达目的地，尤其是在契约华工制时期。事实上，这些迁出人口自始至终受着死亡的威胁，船上的死亡威胁尤大。表8所列的是1847—73年间华工出国的海上死亡率状况，最高时死亡率居然达到64%，这是一个惊人数字，从中也可见出国华工的斑斑血泪。

福建人口迁往海外是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几乎每次国内战争或饥荒都伴随着外迁的高潮，据统计，1904—1926年间，福建人口迁移马来亚的年均约有5万，1910—1926年间，迁往印尼的福

建人口年均3万；1935—1937年，由于战乱，由厦门出国的每年就达6万。当然，在此期间，也伴随着大规模的回归迁移，但总的看来还是迁出大于迁入。据统计，晋江县人口1829年为632 821人，到1949年为532 721人。120年中，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万多人。其中除了战乱、灾荒、瘟疫而死亡外，大部分是迁出。从中可见福建人口外迁的情况。据估计1900年后的50年间，福建人口每年约迁出5万，共约250万。

表8 按输入劳动力国别计算的华工海上死亡率（1847—1873年）

输入国别	船次	装船人数	海上死亡数	海上死亡率%
古巴	31	14 952	5 509	36.84
秘鲁	26	11 471	4 036	35.18
美国	4	2 523	1 620	64.21
圭亚那	15	1 445	433	30.00
巴拿马	2	752	168	22.34

资料来源：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207页，中华书局，1981年。

由上可见，近现代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规模是巨大的，波及的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地区范围是广泛的，而迁出人口大部分是青壮年的贫苦农民；而且，这些迁出是与当时国内外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无论是单向迁移还是回归迁移和再迁移，都明显地带有集体迁移的性质。

（三）当代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新趋向和新特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长期的外扰内乱局面，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也开始了新的转折。

解放初期，开始了自由迁移的新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回归迁移。很多长期生活在海外的福建人也纷纷回归祖国的怀抱，回到家乡安居乐业。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迁出国外与亲人团圆。

但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干扰，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失误，致使回归迁移的人口再迁移现象的产生。这一时期外迁的主要是有海外关系的人。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重视侨务政策，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另外也由于我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搞，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国际迁移出现了新趋向。很多华侨人口回归故土定居，或把子女送回祖国上学或工作，同时，国内也有一部分侨属迁出与家人团聚，这充分体现了自由迁移的性质。另外，出国求学，劳务输出等形式的迁移也有增加。

应该指出的是，在越南制造的排华过程中，很多难侨被迫离开越南，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回归迁移和再迁移的现象。仅我国就接受了26万多难侨，这些人除安置在广西、广东和云南外，也有一部分安置在福建省内。

总之，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是时代的产物，是与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相吻合的。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过程也反映着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特点。而这些迁移特点与其它国家的国际迁移特点，既有相通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值得深入去探讨和研究，其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无疑是重要的课题之一。

### 三 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动因和类型

影响人口国际迁移的因素无疑是很多的。这些因素之间，不仅有主次、直接间接之分；而且也有一定的序列性和层次性，探究动因，就必须从多因素中找出根本的因素，并说明这些因素是什么和如何在迁移过程中发生作用。

宏观地看，人口国际迁移的动因牵涉到四个方面：迁出地、迁入地、中介和个人或家庭原因。这四个方面的诸因素的共同作用诱发了迁移行为的产生。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要寻找促使迁移的根本原因，就必须从迁移过程本身去寻找。笔者认为，对迁移动因的探析，从社会环境和个人行为的角度去探讨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迁移总是—定社会环境中的迁移，迁移者也只是社会环境中特定的个人。前者指社会内部的结构及其演变，后者指个人在此社会环境中的适应性与变革性。

（一）社会环境因素论。迁移行为的产生取决于四个环节：①对迁出地的不适应或变革倾向，②对迁入地的知识和向往，③迁移过程所必须的客观条件，④迁移者的个性。

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社会学结论仍然是有效的。但仅有这些概念性的结论也是不够的。“推一拉”理论说明了迁出地对迁移者的推力和迁入地对迁移者的拉力,但无法说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和地区不平衡特征。惯性原则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推一拉”理论的不足,使迁移具备了更充分的必要条件,但同样没有说明不同个性的迁移者的迁移行为。重要的也许是,传统理论难以从根本上说明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背景下的迁移行为差异。

这里指出,迁移动因涉及到的两个方面是有区别的。相同的个人迁移的动因在于社会环境的剧烈嬗变,相同的社会环境下迁移动因在于不同的个人。因此,区分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和个人行为的作用是有意义的,虽然二者的区分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但二者的作用差异是显然的。为什么迁移者多为闽粤人?为什么迁移者多往南洋?为什么迁移者要迁出故土?这些问题集中地反映在迁移过程的四个环节上。迁移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或者说间接因素在于当时的各种历史背景: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等诸多社会结构要素,它们的表现是直观的静态要素。

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无疑是闽粤人迁往东南亚的重要条件。迁移者体质、生活和谋生手段的适应性决定了他适于在迁移后的地区生存。而这是通过以后的迁移实践得到验证的。正如史实所记载,一开始,闽粤人迁移多出于自发,其动机和目的均非出于谋生,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的。而这又为后来的迁移提供了知识和倾向。显然,这是一种自在的环境,并没有很多人迹的痕迹。

使迁移成为谋生方式的静态环境是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闽粤和南洋,自然地理的话多相似之处,使得谋生的手段也存在相似之处。而诱发迁移的便是闽粤的人口稠密,“几无可耕之地”,加上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地主的剥削压榨,农民、手工业者生活窘迫。相反地,南洋则是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易于谋生,这无疑是对闽粤下层劳动人民的一种诱惑。既有前人的先例,一些人前往南洋谋生是可以理解的。在闽粤迁往南洋过程中,有一种现象是颇引人注目的:迁出者多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从闽粤的农村迁出,迁入地大多是南洋的城市或集镇,其迁移过程也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

但是,仅有诱发迁移的静态社会环境,并不总是导致迁移,尤其是国际迁移。一方面,人口毕竟具有很大的惰性,在一地居住久的人是不会轻易迁走的,另一方面,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安土重迁,除非到了非常时刻,人们是不会迁移的,中国人对艰苦环境的适应性是惊人的。因此,促使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主要并且直接的因素是动态的社会环境变迁。

前述,最初的福建人迁居海外是自发的,或由于经商或由于外事往来或由于战争而最终“流寓”下来。而这虽给后来的迁移者提供了榜样,但却非诱使以后源源不断外迁的直接原因。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动。

为谋生的迁移者,大多来自下层的劳动人民,如农民、手工业者等,且大多为青壮年。这是为生活所迫而外出谋生的最重要特征。而这又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福建的经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发展缓慢,而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却相当迅速。如从西汉元始2年(公元2年)到清光绪13年(公元1886年),全国人口从5959万升至37763万,增长5.34倍,而同期福建人口由4万升至2474万,增长617.5倍,增长速度相差114.6倍。光绪23年(1896年)人口曾增到历史空前规模的2683万人。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几无可耕之地”,按清嘉定时人口数计,全省人均可耕地只有3.29亩,同治年间减为1.26亩,光绪年间又减为0.96亩。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状况是很明显的。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极为悬殊,劳动人民的生活境况是可想而知的。这样,为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迁移行为便开始产生了。必须指出的是,福建人口的迁移不独只有国际迁移,国内迁移也是很重要的,其历史甚至比国际迁移更早。国内迁移主要也是为了“谋食”和“射利”,流动方向是扩散形的,邻省的粤浙赣都有。而在此之前,历代的中国人口南迁造成了两种后果:增加了福建人口,也曾促进福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民族大融合局面;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迁移的经验,这是国际迁移中不可缺少的。此外,还有省内迁移,主流是汀漳泉的“下府之民”迁往地广人稀的闽北山区。可以说,福建人是富有迁移的传统的。

与经济状况紧密相连的是历代的政治变动,而政治变动又反过来加速或加剧了经济恶化。政治经济因素是导致福建人口外迁的根本原因。早期的政治变动可能跟当时的封建割据条件下的战争联系更为密切。“胜

者为王，败者为寇”，战败者无处逃生，选择海路到海外避难是可能的。另外，宗族械斗、家庭纠纷、派别争涉都可能导致一部分人流落南洋。但这，一般而言并不导致大规模的外迁。

导致大规模外迁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极度恶化。它们通过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等直接的作用因素表现出来。伴随着每一次比较大的旱灾、水灾或战争、瘟疫的是每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外迁。此外，历代统治者对迁移者的歧视政策和“海禁”政策也是重要的原因。而这些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福建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往海外。

后期的迁移，可能跟“亲带亲”方式的联系更为密切。每当一次社会变动来临，不少人便带着亲友或乡友的关系逃往南洋。

这里指出，福建人口国际迁移尤其是大规模的迁移，其主要的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社会环境变迁。而具体到每个时代也是有所侧重的。据李国卿先生的分析，秦汉等早期“流寓”海外的多为探险、政治流亡、朝贡、僧人取经等形式，而隋唐以后，则开始有技术移民、通商、航海、难民移居等形式，到了明清期间，福建人迁往海外主要是“苦力”贸易，而从那以后推动型的自由移民开始占主导地位。

总之，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社会环境变迁的结果；而作为一种迁移行为，它还必须具备客观的中介条件，甚至取决于迁移者本身的个人行为。

(二) 家庭或个人行为因素论。同样一种社会环境下的不同个人，为什么有些人要迁往海外，有些人却没有产生迁移行为？这涉及到迁移者的家族、家庭以及个人的个性。迁移者，不是迁出地的平均人，而是具有某种特定条件和某种特质的个人。

迁居海外的人多为青壮年，这些人既适应迁移的环境，又是家庭的主要谋生者，因此富有冒险精神。最有勇气迁居海外的是他们，同时受家庭约束最大的也是他们。早期出国的人大多要么无牵无挂，要么兄弟很多，否则，除非举家迁移，单身外迁是较少的。

最早多为单身外迁，这跟迁移者的个性是有关的，不仅要有冒险精神，而且必须有那种能力。其中，有因经商而逗留他乡无法生还的，有因避祸而冒险迁出的，有因海盗掠夺而去等等，虽都带有谋生的经济性质，而各人的具体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表9 迁移动因的分类

原因类别	占百分比
经济压迫	69.95
南洋关系	19.45
天灾	3.43
企图事业的发展	2.87
行为不检	1.88
地面不靖	0.77
家庭不睦	0.77
其它	0.88

资料来源：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

而到后来，虽是因种种原因而出去，但有前人的经验或有亲戚在外，或同乡提携，比起第一批出去的人，所担风险相对较小。这些人往往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些。根据陈达先生的调查，各种原因出国的比例大致如表9所示。占绝大多数的是经济原因，为69.95%；其次是有南洋关系的，天灾第三。说明福建人口迁移海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生，因为当时在国内经济窘迫，而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异国他乡谋求生路。

个人行为的因素在迁移中有正作用，也有负作用，迁移反映了迁移者的迁移欲望、倾向和个性，但同时，也可能受其它因素如家庭的制约。有时迁移并不反映迁移者本身的意愿。

一般说来，福建人口国际迁移中个人行为因素有比较明显的特点：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在年龄上趋向于青壮年，性别上倾向于男性，女性很少，迁移者大多来自乡村，尤其是贫困乡村或人口稠密地区，社会地位普遍较低，以商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为主等等。

迁移过程，尤其是国际迁移过程，是一种淘汰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从出发地实际迁移的人只能是带有特定个性的人，其迁移行为的产生不仅取决于迁移两地和中介条件，还取决于他自己的迁移倾向、迁移欲望以及特质。

(三)迁移类型。人口迁移过程并没有什么带普遍性的规律,其形式以及特点,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甚至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因此,迁移类型的归纳便成为分析迁移行为的基础。但是,对迁移类型的理解也不是绝对的。从现有的理论看,大多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迁移过程的类型归纳,其分析与探讨无疑是迁移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但迁移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各方面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绝不可能用现成的理论加以诠释。

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过程,各个阶段上有其特点,类型也是可分的。总的来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背景下,迁移对于长期凝固与束缚在小农经济上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而这种突破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口自由流动是有区别的。最明显的特征可能在于,中国人口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大多带有被迫的性质,尤其是大规模迁移的情况。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对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加以归纳可能是比较合适的。通过对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和动因的分析,这里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自发型、强迫型、推动型和自由型。这四种类型基本上反映着福建人口迁移过程各阶段上的特点,但在每一阶段上也可能有交叉。

自发型国际迁移,这种类型大多发生于早期的情况。因为这时福建人“流寓”海外并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大多是因为外事往来、僧事往来,或战争或经商等,在异地逗留无法生还,从而居住下来,其动机和目的均非为了迁居海外,因此称之为自发型的国际迁移。

强迫型国际迁移,大多是在契约华工制期间发生。一方面迁移者是社会环境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猪仔”贸易的对象。在海外,他们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只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谋生,但结果因诱拐的形式而与动机相悖,因此称之为强迫型的国际迁移。

推动型的国际迁移。指历次政治动乱、社会动乱期间发生的迁移。迁移者本身的迁移欲望并不强烈,但同时却具备着迁移的客观条件,因此,一当战争或天灾等社会动乱产生时,他们也被推向海外,其动机和目的更多在于恢复原来的生活状况。

自由型的国际迁移,主要是在解放以后发生的。迁移作为谋生手段的色彩淡化了,主要的形式转化为与亲人团圆,或求学等,迁移的动机和目的是在迁移倾向支配下产生的,带有自由移民的性质。

必须指出,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四种类型不是单一的,而是交叉或重合的,只是其侧重点与主要方式大致如是。这里所做的仅是大致的归纳,作为理论,类型分析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 参考文献:

- 1、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2、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3、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 4、高事恒:《南洋论》,南洋经济出版社1947年版。
- 5、庄为玘:《晋江新志》,新志出版委员会1948年版。
- 6、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 7、华金山:《福建华侨史话》,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1983年版。
- 8、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9、沈已尧:《东南亚—海外故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
- 10、郑民等:《海外赤子—华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11、温广益:《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 12、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13、《华侨史话选编》,第一辑,“福建侨乡报”编(1984)。
- 14、《华侨研究论文集》(3本),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
- 15、《福建历史地理(改编本)》,第3册,福建省地图编纂委员会印(刻印本)(1976)。
- 16、《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集刊》,厦门大学南洋所编(1958)。
- 17、《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和华裔》(陈烈甫著),复印本(1955)。
- 18、《华侨人口参考资料》,复印本(1955年)。

(本文责任编辑:徐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